

贾泽林 著

走进世界
著名学府
丛书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ENTERING THE FAMOUS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走向列宁山

— 莫斯科大学

3
1
4

贾泽林 著

走向列宁山

——莫斯科大学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列宁山: 莫斯科大学/贾泽林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走进世界著名学府丛书)

ISBN 7-5006-4239-3

I. 走… II. 贾… III. 莫斯科大学 - 校史 - 1950
~ 1999 IV. G649.5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748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 cyp. com. 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47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 × 1092 1/32 7.75 印张 2 插页 158 千字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 000 册 定价: 12.80 元

本图书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目录

1	我与莫斯科大学(代前言)
6	从来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
15	“在路上”——记得与不记得的
27	列车广播决定的人生命运
35	永远的斯特罗门卡·五个“第一次”
51	列宁山上的科学殿堂和堡垒
60	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知识精英的摇篮
75	“解冻”·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
82	“撼动列宁山”
89	“第二大学”与“六十年代人”
96	“非党的共产党人”弗罗洛夫
108	弗罗洛夫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由来
114	“二重性”生活
122	多风多雨多事的留学生活
140	毕业的日子·苏联式教育
154	1989年:那个漫长而又难忘的秋天
165	关于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补充记忆
180	莫斯科大学三个老师的命运
193	传统与历史·现实与改革
210	二十世纪结束于1989年末……
236	读完一本敞开的大书



我与莫斯科大学 (代前言)

我与莫斯科大学

人的一生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当然还可以细分为“学龄前”、“学习”、“就业”和“退休”等四个阶段):以学习(知识和技能)为主的阶段和以就业为主的阶段。“就业”当然并不意味着不再学习,不过“就业”后的“学习”大多属于广义上的“学习”,即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以“学习”为主的人生阶段,而从广义上则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上过“我的大学”(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其第三部即为《我的大学》,他说的大学通常被理解为“社会大学”)。从这种意义上,我可以把每一位经历过、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以



学习为主阶段的人都看成是自己的校友和学友。从我的年龄来说,我算得上是“老同学”。我写的《走向列宁山—莫斯科大学》,是一个“老同学”的学历回忆和感受。与诸位校友和学友不同的地方,仅在于我就读的那个大学是一个有特定名称的具体的大学即莫斯科大学,然而我写到的自己对读“大学”的体会却很可能是每一位读过“我的大学”的人都有过的体会,都曾经经历过的心路历程。我这个“老同学”是一个“就业(工作)”多年的人。从1959年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到1999年12月退休,我已工作了四十年。我写的“学历回忆”渗透着四十年的人生体悟。

1999年年中,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跟我打招呼,说你将在年内退休。于是我决定在退休前把我正承担的“任务”全都搞完,不把“任务”带到退休之后去,以便达成自己的心愿:彻底了无牵挂地退休,在2000年到来时,自己能够一身轻松地跟大家一起走进新的千年。谢天谢地,我做到了。为此,首先,我赶着完成了我承担的“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按计划和规定,该项目应在1999年底前通过“结项审查”。1999年12月22日,由五位专家组成的“鉴定会”审理了该“项目”的完成情况,认定该项目“结项”。继而又赶着完成浙江人民出版社邀译的《俄罗斯思想》(文辑),2000年10月初该书已在新华书店出售。

能够把一切“工作”结束在二十世纪,结束在退休之前,是多么舒心的一件事。

“退休”固然不是生活的结束,但“退休”似乎也不应是新一轮工作的开始。“退休”的含义似应是:从此可以按



自己的意愿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必带着“完成任务”（“不得不做”）的心情去做什么。“退休”是获得自由（诚然是有限得很的自由）的一种方式。就这样，我带着从此置身“事外”的心情，欣然踏进了“退休”境界，决定从此不再应承任何不合自己意愿的“工作”。

此时，徐友渔跟我打招呼，说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出一套“走进世界著名学府”的丛书，他推荐我写本有关“莫斯科大学”的书。不久，两位编辑找到我。我欣赏他们的创意，他们的创意给作者留下了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很符合我现在的心愿，与按自己意愿安排自己生活的原则不矛盾，于是我便欣然地答应下来。

我的意愿是什么呢？

苏联、苏俄哲学、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成了我一生一经“结缘”便永远摆脱不掉的“情结”。

我们那批去苏联留学（1954年）的人有一千多人，到莫斯科大学读书的不下几百人。与我的那些同学们相比，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是：我们的青春年华是在那里度过的；我们之间的不同点是：在毕业后的几十年里，我始终把苏联和苏联哲学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苏俄哲学”是我的“专业”。到某个国家留学的人可能很多，但把他上学的那个国家和那个国家的某个领域当成自己专门研究对象的人却并不多。几十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围绕“苏俄哲学”展开的。我为它写过并出版过《苏联当代哲学（1949 - 1982）》（1985年出版），后来我又主持撰写过《八十年代的苏联哲学（1980 - 1989）》、《苏联哲学的演变（1917 - 1991）》和《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1990 - 1999）》。从学术角度说，我对我所研究的对象进行了长期的、历史的和

跟踪性的研究，对这个对象做出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阐述。据我所知，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俄国本身在内，迄今为止都还没有人对苏联哲学及其演变、尤其是对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做过如此完整的叙述。

在研究“苏联哲学”和写作有关“苏联哲学”的著作的过程中和那之后，老觉得还“缺”点什么，老有不够“圆满”的感觉。后来，尤其是当写这本有关莫斯科大学的书的邀请提到我的面前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之所以有不够“圆满”和“缺”点什么的感觉，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机会写写促成我走上“苏联哲学研究”道路的始因和动因，写写我们的母校、写写我的大学生活、写写自己的“心路历程”（精神成长的历史）、写写与我就读的哲学系和与莫斯科大学息息相关、鲜为人知的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写写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在那五年里酸甜苦辣的体验和后来这个国家兴衰浮沉在我们心中引起的强烈感受。而所有这些都是无法写到学术著作中去的。我敢说，这些体验和感受，虽然是“个人”的，但其意义和带给人的启示绝不亚于“学术”。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陈年往事，历历在目，令我激动，令我慨叹，恍然意识到那五年对自己后来几十年生活的影响竟然异乎寻常地深刻。

现今，人们要了解莫斯科大学并不难。有关莫斯科大学的书和材料，现在已不难找到。在“互联网”上，只要键入 [http: www. msu. ru](http://www.msu.ru). 或 [www. philos. msu. ru](http://www.philos.msu.ru), 就可查到有关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相当详细的介绍（俄文和英文）。不过这些材料均属纯客观介绍，其目的是给那些准备报考该校或进该校进修的人提供有关该校各方面情况的较为详尽的材料，颇类似于“升学指南”或“名



校概览”。

可我们知道，每个大学都是一种丰富多采的文化现象，是一座生动鲜活的人文景观，再详尽翔实材料和数据也不足以说明一个大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给我提供了这样难得的机会，让我能够从更广阔的范围，从更人性化的角度，向读者、向诸位校友和学友介绍我的母校——莫斯科大学。还要感谢他们给了我回首往事的机会，让我在六十五岁过去之后，能够在追忆和怀想中细细品味略带苦涩的幸福。

在这本书快写完的时候，思绪一闪，突然间我感到自己一切都明白了：我这一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研究苏俄哲学。我在几十年间写过的东西，只有一个主题，即“苏俄哲学”。而我在现在这本书中写到的我的“经历”和有关的“故事”则全都是在研究“苏俄哲学”的过程中发生的，全都与这项研究本身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我的路之所以会这样走，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曾在莫斯科大学读过书和从那里毕业。也就是说：是莫斯科大学决定了我后来的一切。从这个角度说，写莫斯科大学是我必须做的。

感谢我的母校——莫斯科大学，这是我惟一能说而且应该说的一句话。

2000年10月30日

于北京安贞桥畔

从来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

走向列宁山

1999年6月28日,我们搭乘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莫斯科—北京”航班的飞机,准时于莫斯科时间晚八时四十五分起飞。从高空下望,莫斯科灯火通明,灿如银河落地,心中默默地与它道别:“再见喽!”

只说“再见”,不说“别了”,已成为我多次与它道别时的惯用语。

不说“别了”,是因为自己老没有“这将是最后一次访问”的那种清晰的预感。

我很明白,当下的这次道别可能并不是永别,但这样的道别每发生一次必然离“永别”更接近一次,而总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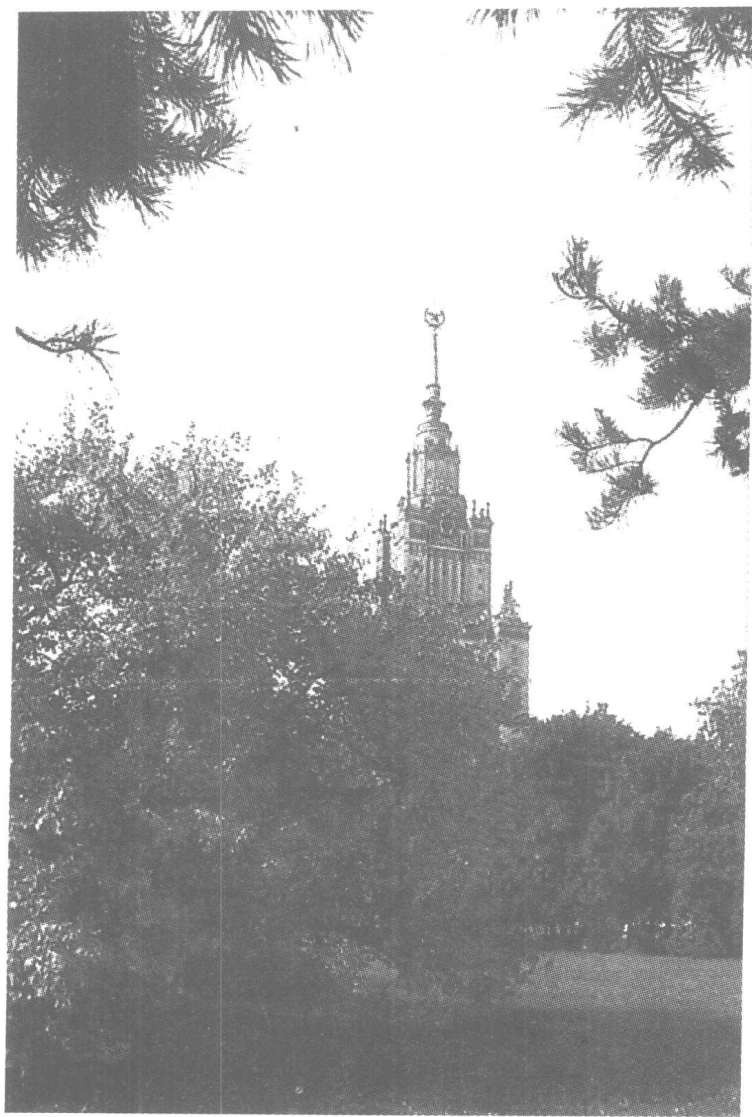
次道别将是永别，更何况谁又能保证当下这次道别不就是那“最后”的一次呢？！

从1959年夏我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到1989年重返莫斯科，其间间隔长达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世界、苏联和我们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有些变化堪称是巨大的、世纪性的。而从1989年到2000年的这十二年间，苏联和东欧诸国发生的“剧变”，则只能用翻天覆地这样的字眼来形容。

从1989年10月那次访问苏联算起，到1999年6月的这次访问，在十一年间我到这个大国访问，已有六次之多。

1999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和我的同学、我的学生，一起造访我们的母校——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当我们登上列宁山，望见莫斯科大学主楼那高大的身影时，我们全都激动不已。对我的学生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直面心仪已久的大学。宏伟高耸的大学主楼，“列宁山”上的绿地和白桦，高远的蓝天和浮动的白云，使他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赞不绝口。对我的同学（我们一道在这个大学读书）来说，这可能是他八十年代以来的第四次重回“母校”。而对我来说，这则是第六次，这次造访距我此前一次的造访（1998年9月），相隔仅十个月。坐落在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仿佛有某种魔力，不管你是初次见到它，还是第五次第十次见到它，它总是能在你的心里唤起第一次见到它时产生的那种莫名的激动和狂喜，给你留下的是永远清新、鲜明的印象。

莫斯科大学的俄文全称为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俄文简称



莫斯科大学主楼



为 MTY。译成中文为：“以罗蒙诺索夫命名的莫斯科国立大学”。俄文简称可音译为：“埃姆戈乌”。在俄国，MTY 三个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世界上，很多知识界人士也都知道 MTY 三个字指的是什么。

把“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列入“世界著名学府”，是完全正确和恰如其分的。把“莫斯科大学”称之为“俄罗斯知识精英的摇篮”，既名副其实又当之无愧。

称得上“世界著名学府”的大学，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首先，这所大学要既有悠久的历史，又长盛不衰。其次它除了拥有规模宏大、环境优美的校舍和一整套完备的科研、教学、生活设施之外，还拥有保证高质量教学水平的实力强大、学术高超、新人辈出的教师队伍。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衡量大学业绩的主要标志是：它培养出多少栋梁之材，这些人才是否在国家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莫斯科大学具备了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全部条件。莫斯科大学在它存在的二百四十五年中，为俄罗斯培育了无数知识精英，为繁荣俄罗斯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有幸在 1954 年成为这样一所举世闻名的大学的学生。

有相逢必有别离。相逢不会总有，而永别却必将到来。多次相见，多次别离，相逢时的欢悦，别离时的痛楚，可是一个人承受得起的？！

多次告别，之所以没有这将是“最后一次”的感觉，细细想来，可能是因为我：即使今后我不再来到这里，即使当下这次道别就是最后一次，我与它的联系也不会因

此而中断。自己的青春岁月是在这里度过的，自己的毕生“事业”是因为研究它而存在的，即使从此不再来了，与它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绝对无法割断的。

从1954年到1959年，我们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了五个年头。五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其背景和真相，我们当时并不了解。从1959年到1999年的四十年间，我虽然一直在研究苏联哲学，为此而阅读过大量的材料，隐约地感觉到纸面材料背后隐藏着许多东西，虽然也能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发现一些被精心掩饰过的矛盾和斗争，但许多事件的真相却一直被密封得严严实实。

那五年里，我们的生活与莫斯科人和苏联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生活的内容与苏联人生活的内容，从总体上看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和一致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是那五年苏联社会生活的观察者和见证人。

1955年，我们参加了莫斯科大学建校二百周年的庆典；

1956年，我们感受到苏共二十大带来的积极变化，模糊地感觉到“解冻”给思想界带来的丝丝暖意；

1957年，我们和苏联人一起欢庆过伟大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现场聆听过毛泽东关于“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讲话；

1958年，我们听到过苏联人对中国“大跃进”的质疑；

1959年，种种征兆已使我们模糊地预感到中苏关系即将发生变化。那时，两国关系虽还不到“破裂”的“边缘”，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境，乍起于青萍之末的风波，已使我们有了不祥之感。



莫斯科大学历来与苏联的社会政治密切相连。政治风云可能并不直接源起自这里，但它从来不能置身在政治事件之外。即使一些理科的系，也难避开政治的牵扯和受政治的干预。与许多国家不同，在苏联，第一，几乎把所有的东西（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不管是文学艺术还是工业农业等等）都变成政治和赋予它们以意识形态的意义，在这个国家里几乎不存在与政治无关的领域；第二，苏联一贯的行事方针和风格就是把所有的事情（不分巨细）尽可能加以“神秘化”，把事情真相千方百计地“隐藏”和“密封”起来。许许多多历史事件，政治方面的风风雨雨，都被当成“绝密”永远沉入历史的深渊。以致于人们得出一种认识：那个国家如果不发生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变化，“解密”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时苏联人自己都不清楚事情的真相，“知情权”彻底被剥夺，这在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而我们这些外来人，这些乳臭未干的年轻学子，就更是懵懵懂懂。我们听到和看到的，大都是一些模模糊糊的表面现象。更何况我们还有“留学生守则”要遵守，受着组织纪律的严格约束。即使没有这些，紧张的学习和无数的考试也已经使我们焦头烂额，无暇旁顾，争取顺利毕业成了我们那时追求的最高目标。说实在的，那五年，我们是糊里糊涂地度过的。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的脚步出乎预料地加快了，急转直下的形势给了我们以少有的机会，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得知许多事情的真相。

1991年12月，苏联发生剧变，苏联消失，俄罗斯重现于世，许许多多的“禁忌”被破除，长期被厚重大幕遮盖起



来的一些事件的真相逐渐地、慢慢地被揭露出来。我们终于有可能在二十世纪结束、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历史转折时刻，重新审看 1954 年到 1959 年那五年和 1959 年到 1991 年间某些(而非全部)历史事件的“真相”。

当事情的真相暴露在面前时，除了感到震惊之外，还会感到屈辱——几年或几十年里，一直信以为真的事，其中许多竟然是虚假的或被篡改过的。内心深处会不由地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愤慨情绪：原来我们一直都被蒙在鼓里，一直被人蒙骗和愚弄。这样一来，便不能不对自己此前的研究、此前的看法、此前的结论产生动摇，便不能不对从前深信不疑的“真理”产生怀疑。这使我们意识到：“亲历”和“在场”虽是认识的重要条件，但它们并不足以保证“认识”的正确。所有这些难免使人感慨万端：“真相”的暴露竟然需要三四十年，那可是一两代人成长的时间。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三四十年?!三四十年里，有多少人永远地退出了人生的舞台！逝者再无机缘得知事情的真相，只能至死信“假”为“真”。如果信“假”为“真”于国、于民、于己并无大碍，倒也罢了。只怕是“真”“假”长期颠倒会误国、误民、害己。慨叹之余，我们不由对历史的公正肃然起敬。历史本身从不隐瞒历史事件的真相。历史终有一天要还“历史事件”以原貌。时间与保密是针锋相对的。事件无论多么扑朔迷离，多么隐晦曲折，“保密”多么严密，其“真相”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不暴露是完全不可能的，问题仅在于暴露的迟早而已。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产生一种新的感觉，那就是我好像在读一本已经敞开来的大书，虽然敞开得并不那么彻



底,却已足够令人满意了。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报刊杂志书籍披露了许许多多历史事件的真相。多年当作“宝贝”一般封存起来的“秘密”,而今已无“保密”的价值。把书敞开来,敞开给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人民,让创造历史的主人去评断是非功过,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罗曼·罗兰写于1935年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写于1936年的《从苏联归来》,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要讲真话。

惟有真实的东西——真实的感受、真实的见闻,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即使那对象是我们热爱的、崇敬的、信仰的,我们也必须公正而客观地对待它,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能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我们就要故意地夸大它的优点,故意地掩盖它的缺点。可以像罗曼·罗兰那样:出于某种考虑,把写好的东西“封存”五十年一百年,但写下的东西本身应是真实的。罗曼·罗兰是我喜爱的作家,青年时我就曾反复地读过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在《莫斯科日记》中那种欲言又止的矛盾心态很令人同情。他用很委婉的笔调写出了他的所见所闻,他尊重事实,既不夸张,也不缩小。他的那些感受,我们也有过。罗曼·罗兰是个大作家,但从他的“日记”看,他完全是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世事。

我始终相信普通人(必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感受和体验是公正而真实的。凡是“超常”的、“离谱”的感受和体验都必然不可能符合事实。最可信的就是正常人的感受,正常人的判断,因为事物大多都是正常的。普通人的感受